

后 记

关梦龄没有获得特赦，他是刑满释放的。获释那年是1963年。关梦龄后来的情况怎样？

我拜访了曾经与关梦龄一起改造的原国民党将领、关梦龄就业之后结交的工友，以及他的女儿……熟知他的人告诉了我想知道的大部分情况。

关梦龄遗稿纵贯一条感情的潜流，那便是对独生女儿关棣炽热的爱。女儿与他保持着通信联系，开初传递母亲的期待，后来便报告自己的生活。一次，她告诉父亲，女儿的京剧表演轰动了全市，上了报纸，登了照片……女儿不时地用美好的生活感染着囚禁中的父亲，召唤着父亲的归来。虽然关棣的书信有喜欢女婿的外祖父的指点和恪守礼教的母亲的授意，但是此后的种种表现看得出关棣是不失一个懂得感情的人。

关梦龄在囚禁中对前程有许多美妙的想法，想成为我方的特工人员、想当政协委员……最后想得实际了，那便是“大人孩子团聚一起，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关梦龄刑满被安排在抚顺园林处做工。他迫不及待地奔赴徐州，去会见女儿。那一幕是十分揪心的。

“大约是1964年，父亲来徐州，住在姥爷家。我那时是剧团的学员，我知道消息后打算去看父亲，请示剧团的领导，剧团的书记

说：“看看可以，但你要与他划清界限！”到了姥爷家，姥爷说：“这是你的爸爸！”我随口叫了一声“爸爸！”爸爸哭了……他说他要带我去抚顺。我立刻想起书记的话，赶紧说：“不，我跟你断绝关系！”爸爸哭了，哭得很厉害。姥爷训斥了我……”

这是关棣亲口对我说的。那是1979年，我去徐州拜访关棣和她的母亲。这时关棣已经更改了姓名，随了继父的姓氏，并且根据“革命需要”从文艺舞台转到了工厂的翻砂车间。那年她已经是一个9岁女儿的母亲了。她长得个头不高，体态略胖，圆脸，单眼皮，已经没有文艺人的风采了，但言谈起来质朴、纯洁可见，热情、直率袭人。她平和地对我叙说了与父亲的最后一次相见。

我欲采访关棣的母亲，关棣热情地传递了我的希望，又热情地回绝了我的希望：“妈妈在我11岁那年改嫁了，妈妈与继父又生了四个女儿，我们一家处得很和睦……”于是，我知趣地收回了我的希望。

关梦龄只身回到了抚顺，投入了孤寂的自由生活。关梦龄没有什么想不通的。早在1948年一个公安干部就对他说：“你的历史可以清楚，却不可能清白。”关梦龄获释的前一年，1962年，蒋介石集团企图反攻大陆，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动员令——接近“文化大革命”的神州大地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这形势对关梦龄来说是清清楚楚的。

骨肉可以割断，亲情怎能剥离。虽然女儿向他，向他的组织声明，断绝父女关系，但是关梦龄依旧用自己微薄的收入来贴补亲生的骨肉，依旧在口袋里装着女儿的相片。这不禁使我想起苏联的革命家捷尔任斯基，他在华沙监狱的单身牢房里陈列着儿子亚西克的全部相片，任儿子从四面八方看着他，他在各个角落看到儿子。一个是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一个是由反革命转变而成的普通公民，其爱子之心如源一流啊，人之天性。至此，女儿仍是关梦龄的精神寄托，生存的动力。以至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关梦龄为了求得一条红色的袖标佩戴在女儿的胳膊上，决心断绝父女关系

……“信发走了，他包了饺子，呷着烧酒，睡了一宿好觉。”这是一个工友告诉我的。这使我想起莫泊桑的《一个哥尔斯方式的复仇》，儿子被强盗杀死了，老婆子发誓为儿子报仇，她已年迈无力，便精心训练一条家犬，家犬把强盗咬死了。仇报了，誓言实现了，“老婆子在傍晚的时候回了家。那一夜，她睡得真好。”

工友们又告诉我一些关梦龄的生活琐事。

关梦龄来园林处那会儿天已经冷了。他穿着扎腿的黑棉裤，矮小的个子，黑面皮，大嘴叉，挺丑，不显眼。一开始谁也不敢接近他，怕“粘包”。但是总在一起干活，总要有些来往，比如，一起劳动问个钟点什么的。奇了，关梦龄不戴表，但一报钟点差不了多少！这人不凡哪。没几天，全处二百多人他全能对上号，姓名，家庭人口，爱人情况……一清二楚。连临时工也不例外。这人浑身是眼睛，浑身是耳朵！大家心生几分恐惧。但是关梦龄待人热情，跟谁都合得来。这也不是消除大家的疑虑，倒是他的生活的特殊习性为人们表明了他的心迹。关梦龄独身一人，小屋总要有一些打牙祭的东西，照他的随和脾气，一定会主动邀人品尝的，可是事实相反，关梦龄从不请工友吃他的食品；关梦龄从不沾燃油，即使抽烟，也只备火柴，不置打火机；打了园林的碗，自己掏钱赔偿……慢慢人们愿意接近他了，谈话也敢向纵深发展了。

“你认为写国民党特务的小说、电影，哪一部写得好？”

“我看《红岩》不错。”

“你在看《燕山夜话》呀，有意思吗？”

“很有学问。”

“你没多大罪吧，若么怎么才判十五年呢。”

“留下我，毛人凤、郑介民都会吃惊。”

“来咱们公园有什么打算？”

“人民公园为人民。”

关梦龄关心两桩婚事成为人们的美谈：一个是喂鹿的工友，他虽然离了婚，但藕断丝连；一个是养花的工友，此人搞对象脸红，见

女人便跑。关梦龄都积极献策,热情奔波。但是当有人向他提出再娶之事时,他谢绝了:“我不办了,再办,我就是第三房了,对不起女儿呀。”可以说,关梦龄这个新人很快就被人们所接受了。大家认为:这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的人。

但是不愉快的事情时有发生。关梦龄在花卉组,他所从事的劳动是培育美丽的花朵,供游人观赏。每日的活计是到老虎的笼子里清扫老虎饱餐之后的残骨碎肉,用来沤肥浇花;到山上割蒿杆,为硕大的花朵支撑腰身……实质这是务农。这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活动忽一日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了,于是变得不那么简单了。公安派出所提出意见:公园里常有坏人出没,放这样一个人不合适;学大庆经验为工人评功摆好,给不给关梦龄评?争论不一,结论不能评。关梦龄陷入迷惘。其实关梦龄是受过左的教诲的。早在长春看守所,斯大林死,犯人在监舍里不准动,有几个走动的,便被砸上了脚镣;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展交罪运动,管教人员布置人人要写“呈请处死的申请书”;以至大跃进,抚顺一座大楼二十几天竣工,中学生大搞发明创造,而跃进的结果却使战犯尊崇的管教干部大食“瓜菜代”……虽然如此,关梦龄仍不相信他努力争取来的权利如此被践踏。他逢人便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有公民权啊!”愤懑无奈,又说:“这不是共产党的政策,我要回监狱里去。”紧接着红色风暴刮起来了,人民公园的花盆扣倒了,金鱼倒湖里了,宫灯砸碎了,汉白玉的台阶拆了;紧接着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了!关梦龄以他的经验觉得不对头,他提出许多疑问:

“对战犯都能宽大,老革命家犯点错误就要打倒,踏上千万只脚?”

“踢开党委闹革命,党的政策也踢开了?”

“打击一大片,势必要遍地设监狱,敌人多了对共产党有利吗?”

因为特赦令是由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的,因此战犯管理所便被冠上了“刘少奇的战犯管理所”的帽子。至此,关梦龄进入了艰难

的岁月，同时也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的时期。

关梦龄之所以该死而不死，与他检举揭发了大量的敌特有直接关系。关梦龄在监禁的15年里写了有近百万字的此类材料。凡我党掀起政治运动，对那些由旧社会过来的人都要进行内查外调。关梦龄为不少人，不止一次地出证。据园林处的一个领导同志反映，“文化大革命”找关梦龄出证的外调人员排着长龙，挨在末尾的人抱怨道：“他还成了‘佛’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得挨着号前去拜见！”关梦龄端坐床板，盘着二郎腿，腿铺纸，手擎笔，唰唰唰，几分钟一份。

“××到底叛变没有？”

“××是我党坚强的同志！”（据说，释放之后，成为公民的关梦龄习惯于把共产党称之为“我党”。）

“不对！”

“怎么不对？你拿这份证言与我从前给他写的证言核对一下，保证一字不差，不信我再写一份。”

“混蛋！历史要在我们手里重写，你要按路线斗争需要写！”

关梦龄明白了，造反派要怎样的材料，以及用这些材料干什么。

早在1948年，关梦龄在吉林看守所时，问过一位犯错误的干部：“要想改造好，从哪儿下手？”这位干部告诉他：“你本身最重要的就是老实做人。”在此后漫长的改造历程中，他记住了这句话，他在写材料时，“我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对他们要实事求是，忠诚老实，在材料上，罪恶绝对不夸大，不缩小，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所以我的材料拿出去，他们都相信。”痛苦的监禁，深刻的反省，已使一个杀人的刽子手脱胎成为一个老实的公民，而“无产阶级革命派”为路线斗争需要，要他已复苏的良心再度泯灭！关梦龄不干了，他拒不改口！据在场的工友反映，造反派跟他拍桌子，他也拍桌子！

我十分欣赏关梦龄这一击，这是共产党政策的巨大成功啊。

这使我想起关梦龄遗稿中的一段，他为我改造政策所感动，写道：“旧话‘重恩不言报’，只有竭力报答，永世记在心头。告诉我的后人，重恩报不了也要报，做多少是多少。”这响亮的一击不就是最好的报答吗？

好呵，关梦龄有良心！

据我所知园林处的组织与群众还是讲政策的。早在“文化大革命”前，他们就如何对待关梦龄，多次请教战犯管理所和有关部门，从而把他与其他“四类”区别开来，没有给他更多的难堪。即或“文化大革命”，对他也高抬贵手，在为“各类人员”关门办班的时候，关梦龄还委以重任，叫他担任学习组长，并协助专政人员管理总务。其大胆启用人才实为全国所罕见。然而这一抬举无形中把他推进了灾难的漩涡，当革命深入发展进入清理阶级队伍时，那些关进牛棚的，以及没有关进牛棚的根正苗红的人对重用关梦龄的“革命群众组织”进行了猛烈地攻击，罪名是敌我不分，重用战犯。被攻击的一方无言以对，于是关梦龄被所有的人抛弃了，只有女儿的照片陪伴着他；只有取证来的“革命派”与他对话。他学会了打发时光：一顿晚餐他搞得相当复杂，工友告诉我：“他经常包饺子，丝毫不怕麻烦。”

他热衷测字。1968年冬，他翻阅“红宝书”，第一眼看见的是一个“屏”字，“屏”乃“尸”、“并”组合，人死之躯曰尸，“并”可作“合”解，合于那些作了革命者的行列？还是进入十八层地狱，去会合他那些挨了枪子儿的同僚？自己是当死的，但是人民政府不叫他死。“我深刻地认识了共产党人的宽宏大量，有改造人类的伟大抱负……我感谢共产党对我的再造之恩。”身处水火的关梦龄想到了死，而没有马上死。

关梦龄祖籍新宾县，属抚顺市辖区，这里有他不少亲朋故友，但是那年月无人登门叙旧，无人与之交杯畅饮。忽一日，一故友请他！孤寂中的关梦龄欣然受命，去了。此人恰是本园一个年轻工友的亲娘舅。这位故友没有料到这顿不算丰盛的晚餐，竟为关梦龄去

另一个世界钱行了。

1969年春,抚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挖出了一个“地下黑俱乐部”,罪状是聚众听“黄色歌曲”和篡改“革命样板戏”的唱词儿。首犯是本园的一个年轻工友,此人恰恰是宴请关梦龄的那位故友的外甥!于是阶级阵线在这里明朗起来,国民党战犯是这个“地下黑俱乐部”的黑后台。体育馆召开斗争大会,关梦龄被责令陪绑。

关梦龄这个人有个毛病,死要面子,即使在囚禁中,也不肯接受诸如戴脚镣这种处罚。如今关梦龄不是战犯了,他是一个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竟让他作为“黑线人物”在“红色海洋”里亮相!关梦龄的精神崩溃了。

有个工友对我说,斗争会后他和几个人被押到机关讨论“受教育”的体会,在读“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段语录时,他把“忘记”二字忘掉了,读作了“千万不要阶级斗争”,一时间,他和全场的红色的、黑色的人物都哑然了。采访中有的人不记得这个细节。也许不知道的人没参加这个小会?我知道早在狱中关梦龄便能背下来重要文件与文字,例如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我把全文背诵下来,作为学习引用,对人也好卖弄。”记忆力如此惊人,竟会把八个字的语录漏掉俩!我不很相信,且那时为这段语录漏掉这两个字的罪例太多,而觉得有编织之嫌。但无论怎么说,这个会使他神情恍惚了。第二天,人们便在公园的湖里捞到了他的尸体。具体是哪一天已无据可查了,有人回忆是5月28日,因为这天开工资,他没有来领。领工资的日子人们记得清楚。

他死的决心很大,脚捆着石头,手抓着烂泥。他留有遗嘱,其内容据阅视者回忆:存折有五百元钱,欠工友×××、×××多少多少,要还人家;东西,谁愿意要谁拿去;此外还有一段话:我所能提供的材料已经尽了,我已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对得起我党。

死时,他的口袋里装着女儿的相片。

后事是他的姐姐从北京赶来料理的。

该死的时候,我们没有叫他死;不该死的时候,他自己死了。对于他的死,我们是应该进行思索的。

好在共产党人自己拨乱反正了,用党的决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好在有许多的共产党人和无数的群众对关梦龄有客观的评价,赞扬了他人生的最后时日;

好在他有一个好女儿,她在拨乱反正之初就致函抚顺园林处寻找父亲;又去徐州公证处,办理恢复关梦龄女儿的身份。现在关梦龄女儿的女儿也有了女儿。每逢佳节,女儿都要在家祭上将平安幸福告慰天国里的父亲。

关梦龄,你可以安息了。

李占恒

1998年1月10日于沈阳药王庙